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 萧遥天与五八年 “华文”课本诞生\*

Seow Yeoh Thian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Textbook Version 1958

方美富  
(TH'NG Bee Fu)

## 摘要

一九五八年, 独立时代教科书诞生, 是华教史关键的一年。教科书是教育之本, 课程理念与教学活动无不倚靠教科书的帮助, 就教师言可省却精力, 以学生言, 则利于学习自修考核。学校该教甚么? 怎么教? 谁的知识? 这些问题并非起立行礼问安那么理所当然, 若处理不当, 枝词太繁, 必以笼统贫薄为代价, 牺牲的往往不是一代人, 且最要命是授受者全无知觉。教科书攸关教育普及与常识的培育。如此庞大卷帙, 历来华教史并不深入讨论教科书意义, 本文的主角——五八年制课本, 自不例外, 因而充满玄机与悬念, 那样特殊时刻, 亦注定是不可多得的范例。实则, 五八年教科书由南来文人萧遥天制作, 一切在教条规范前, 政府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放松, 不规则不明确, 加上制作者知识与能力的突出表现, 值得再三体味其中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 萧遥天、华文教育、教科书、中华民国在南洋

---

\* 本文初稿宣读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 第卅三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创新与跨越: 重塑文化的想象力”学术研讨会, 吉隆坡隆雪华堂, 2016年12月3日~4日。

方美富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laysia)。E-mail: kuangren2@gmail.com

## Abstract

1958 was the crucial year for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Chinese textbooks were born on independent day. Textboo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on since they are giving guidelines for teaching's concepts and activities. For teachers, they can save a lot of time in preparing the lessons; for students, textbooks are good for their reference and revision. What to teach, how to teach and who is going to edit textbooks is not a simple question. Textboo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urturing knowledge. If we are unable to provide a good version of textbooks, our entire generation is going to sacrifice, not only for students but also teachers. However, we never take serious discussion about the dominant role playing by textbooks; especially on Chinese textbooks Version 1958. Actually, Chinese textbooks Version 1958 was editing by Seow Yeoh Tian, who was coming from China. He had good knowledge and ability in editing textbooks. Since Chinese textbooks Version 1958 are born in crucial year and has a prominent editor, the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is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words:** Seow Yeoh Tian, Chinese Education, Textbooks, Chunghwa Minkuo in Nanyang

一九五八年，独立时代教科书诞生，是华教史关键的一年。

教科书是教育之本，课程理念与教学活动无不倚靠教科书的帮助，就教师言可省却精力，以学生言，则利于学习自修考核。有鉴于此，学校该教甚么？怎么教？谁的知识？这些问题并非起立行礼问安那么理所当然，若处理不当，枝词太繁，必以笼统贫薄为代价，牺牲的往往不是一代人，且最要命是授受者全无知觉。教科书攸关教育普及与常识的培育。教育是连续不断的历程，中学和大学，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课程上，学力上，应有需要和供给相等的必要，假使这样那样的试题是大学应有，那么中学的华文教材，就不得不从旧书堆里去寻求资源。（汪宝瑄1924）由此回顾历史，将时代变换，一切方生方死的视野，放到教育史彙杂是这时期的特征，这里借用任公的时代触觉：“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启超1985：2）。然而，如此庞大卷帙，历来华教史并不深入讨论教科书意义，这套五八年制课本<sup>1</sup>自不例外，因而充满玄机与悬念。课本代表一种话语模式，那样特殊时刻，亦注定是不可多得

的范例。实则，五八年教科书由南来文人制作，一切在教条规范前，是时政府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放松，不规则不明确，加上制作者知识与能力的突出表现，值得再三体味其中的象征意义。

本文尽可能深描编撰历程，把课文表现方式与实际内容表述出来，这或许是值得争论的时期，但我愿意从本邦华教史较少撰写，由文化资本持有者的视界去处理此课题，从头省视开端。因更看重教科书的文学性，故此着重课本编者与语言、形式、文学自觉的对话。只有这样的基础预设，方能辨识（剥落）历史瞬间——纵使这不过是华教史上模糊的瞬间。

## 一、编撰过程

教科书的编制是特定人组成，出于教育理由或其他，是某一时代条件形塑的构造物，从编写，审查，到读者使用，往往迭压纠缠，甚至角力争战。据林连玉回忆建国前后课程委员会时说，一九五二年先有改编华校教科书提议，而从课程纲要及时间表委员会（Syllabus and Time-table Committee）成立，起自五六年拉萨报告书，最早由林连玉与杨登程代表，林氏抗议认为杨登程“不懂教育”，反建议委任严元章或王秀南。严氏入选。其下二十三各科小组，原华文科课程小组委员会，分语文与文学两组，前者委员有贺光中、林绿野、林连玉，后者由贺光中、白乐山（Baxter）、李秀添、林连玉组成。后林连玉得知“keep him quiet”秘密退出，由张荃顶替。张氏因与林绿野无法调和的分歧，旋即请辞。可知华文组一直是（殖民）政府与华教人士，争夺知识权的战场。第一阶段官方以五年三百篇古文纲要搪塞，故委员会夭折解散。华文组第二阶段，改以委员会严元章当主任，实际成员是萧遥天、赵尔谦、周曼沙、丁品松、魏维贤（林连玉1988：152），还有文怀朗、杨登程（林连玉1988：170）及云飞（萧遥天1979：88）。

独立后第一代课本编撰，今存有萧遥天（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三日～一九九〇年十月廿七日）十分精确的表述。从〈十日游程〉一文，我们得知教育部华文课程委员会相关会议，最迟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还在磋商，两

月开会一次。为保留历史的真实，摘录给大时代留下小小侧影：

八月六日 午七时与尔谦博士连袂搭夜班火车赴吉隆坡，准备八日出席教育部华文课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

七日 晓七时四十分抵吉隆坡，昨夜睡得酣畅，绝无轮尘之苦。转“的士”至联邦大厦，我宿四楼五一三号，赵宿五一二号。皆二月前旧住过的房子，乃教育部事前预定，不然那会这样凑巧。…午前空暇，访问两位不平凡的人物，一为台湾回教访问团团长时子周，一为西德驻马来亚代理大使泡来斯<sup>2</sup>。…午一时濯生，云飞、负东、永振、姚拓依时来联邦餐厅共饭。与云飞交换关于非华校华文课程标准及略读选本的意见。…三时许与赵兄访商务印书馆孙经理<sup>3</sup>，在书堆里玩了两个钟头，购书一百四十多元。善本如《各经传记小学》，《湖楼笔谈说文经字》，《苍石山房文字谈》，《甲骨书录解题》等，近人著述，如马叙伦的《学术论文集》，《读书（笔）〔小〕记》，《读吕氏春秋记》，《说文解字研究法》，杨遇夫的《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文录》，刘文典的《三余札记》，张元济的《斠史随笔》，皆此时此地所难得。晚坐云飞的车，晤王宓文先生伉俪，在座有吴先生毓腾，刘先生怀谷，皆退休的联邦华校总视学官，也一巧事。…

八日 上午九时到联邦大厦开课程会议，云飞为召集人。出席者尚有魏维贤，周曼沙，赵尔谦诸兄，严元章、文怀朗二兄因事不及参加。…整个上午都在会议中，斟酌条文，审查项目，皆煞费苦思，从略。…陈恺兄午后二时来访，夫人张荃病况，最所关怀，因问痊可否？却报告一段传奇性的医案。…晚濯生请客，席设联邦大厦餐厅。王宓文伉俪、云飞、姚拓……俱来，席间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谈及词体的演进，我谓治词史者应兼治乐史，诗的演变为词，是边疆胡乐流入中土之后，为谱叶新调乃产生的新诗体。…与姚拓谈民间乐舞。…夜十一时尽欢而散。…<sup>4</sup>

这是萧氏介入课本编写的因缘，然而不幸的是，对我们这些在六十年后想要偷听他们对话的人来说，历史上只有这样的记录。从书目看来，似为撰写文字学课本准备，亦可见先生读书趣味。林萧的记载之所以显得珍贵，

乃决定于这是仅有的片段，而且时机特殊。相比此后，别说记录，单是对教科书机制反思不足，各种课本编制，因涉及庞大权力与利益，此一“有选择的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sup>5</sup>，究竟甚么才可以赋予知识的地位，谁可以得到project，是学术成就，文学造诣，或其他原因，外人一无所知，更别说事前参与决策，专家监督与事后公众检讨。

本文讨论的是有待华文教育史重估的人物，潮阳萧遥天，南来文人。据大儿萧思齐告知，遥天先生一九三二年曾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这是他美学养成时期，日后卖画策展，谈文论艺，有赖于此。一九四七年应饶宗颐之邀，参与《潮州志》编纂《潮州戏剧音乐志》，并协助吴双玉修《语言志》，这是他治学的开始，可说是很长时期早已浸淫于小学研究。自一九五三年抵达槟榔屿，旋执教钟灵，任高中华文，初中史地教师。一九六〇年起升任华文主任，兼任师范学院讲师，并于升旗山上创办槟光学院，六七年九月退休。萧氏自陈是典型的杂货囊，诗书画无所不好，与港台流亡文人学者多有往还。一世功业在教育与文艺，长于戏曲而又精研小学，一九六〇至七三年编有一二一期《教与学月刊》，乃本邦近世不可多得，兼修文、学之名家。<sup>6</sup> 遥天先生饱经忧患，半生吟哦不辍，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文学感受，使到《华文》显示的眼光，很难在后代复制。

## 二、五八年的意义

据民国部定中学校课程标准时间，国文每周七时（一二）、五时（三四），除作文、习字、文法、文学史等子目外，讲读系每周三时、二时。（许国英1914）马来亚独立前后，保持六到八小时。时间安排，就单一科目言之，尚算合理，五九年起高中分支教学，中学平均七次一周，每课四十分。四九年之后，大量移（遗）民涌入，华文教育界可说都是南来文人天下。对于这些离散浮海人，远行以后，中华民国在大陆既属过去，他们的到来却带进了民国时间，这意味着过去不断进入现在，其中蕴涵的记忆与感情，连接起来形成互相渗透融合的整体。钟灵中学独立前称《国

文》，这是接续而来，直至独立后方逐渐改口《华文》。此中关键，乃五八年课程制的推行。细绎选本之演变，不难发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用的是宋文翰新编高中国文与友联文选，整个六〇年代则几乎是马化版《华文》的天下。

《华文》的出版者马来亚文化事业公司，与友联关系密切，学界共知，其成立日期则较少人知晓，登记于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完全是冲着教科书出版大业而来。<sup>7</sup> 萧氏与友联诸子，本是旧识。他南下开课程会议的日记，就曾到友联聚餐。一九五五年余德宽与方天到新加坡创办《蕉风》，即邀先生供稿。《蕉风》创刊号，已刊文〈食风楼随笔叙〉，投入到南洋直接体验的描写，第二、三期有〈食风与冲凉〉，第四、五期刊〈马来亚的天气〉，第六期到第八期登〈热带女儿〉，期期见报，显然不会是一般读者慕名的外稿。更何况一九五七年四月，散文集《食风楼随笔》正是新加坡蕉风出版社印行，关系非同小可。无论从积极供稿或课程编撰，正是四九年的时间与历史问题，触发了个人与社会的双重性。

若就教科书生命言之，必然是短暂的，凡内阁改组，教育方针必然随着变动，以致我们自小听到大，想望要成为东南亚教育中心，却不知道新到的Plan B因何推翻几年前Plan A，知识界无法把握较为可行的理论根据，仅凭执政者之好恶作为准绳，且轮回不止，转眼Plan C已经在等着，各领风骚三五年。五八年学制以华文教授课程为例，正好相反，课本一而再的出版显示其坚韧的生命力。

五八年课程，同年十二月络续发行，依我过眼所得，至晚一九八五年《中国文学史》居然再版<sup>8</sup>，随后因华教全面采用简体字，教育观念亦往中国大陆靠拢一去不返。然而五八年课本近三十年跨度，历次纲要变革。<sup>9</sup> 如果文化是中心落石，逐渐扩大的水文，如水中着盐，五八年课本当之无愧。以现今改课程则旧课本弃之敝屣的情况，五八年版的影响力可能是本邦最早，也最难以超越。这般精深，如此成就，委实不易。也因此，研究教科书，应当把研究对象放回历史脉络，尽可能描述事件终始，甩掉层累的颜料或尘土，重思它成长的历史。

当时新闻这样写：

因其编纂审慎，内容精确，甚获教育界人士之好评，本邦多数的华文中学，已采用该“马化版”课本。新加坡部份华文中学亦采用该版课本，甚至远至北婆罗洲亦有多间学校采用。砂朥越教育部且指定“马化版”中学华文及各华文辅助科为通过课本，推荐各校采用，使“马化版”教科书建立了国内外的声誉，为本邦华文文化放一异彩。

（《南洋商报》1960年9月23日）

这套影响久远，跨国越界的“魅力”，教育史却至今无人闻问，成了不可解的失踪个案；更别说给予公允评价。此一现象，着实出奇。或许在患有失忆症的马来西亚，我们经常做一些重复工作，也是教育实践难以循序渐进的原因。当事人早已故去，原本应长埋历史底下，因时人评介萧氏展览会，无意间留下蛛丝马迹，使到我们如今欲重寻此一失去的环节，变得可能：

曾受联邦教育部聘为课程委员，一九五八年颁布的中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即系萧氏起草的，当时驾轻就熟，曾为马来亚文化事业公司编了全套的中学华文课本，这是在星、马、婆各华校最热门的课本。

（明威1974）

以上是迄今仅有，直接点名遥天先生正是起草课程标准、编写全套马化版华文课本的文献。

影响建国一代的五八年课本，竟然有如此复杂的身世之谜。究竟当日课程委员会“斟酌条文”所得为何？检视课程标准，以教育角度言，目标太大，便有扑朔迷离之感，不利于实战教师的规划，目标太高，难免有不切实际之弊，故教育目的之拟定必经过反复讨论，无愧托付以反映时代精神。今人还能藉每册前页的编辑要旨窥得当年风采，第四条必得一提：

本书选材更兼具下列特点：

甲 适应马来亚环境并发扬立国精神；

乙 表现中华文化之特性及华人之高尚品格；

丙 涵育现代民主与科学观念。

五八年《华文》是“文选型”教科书，强调“玩索”久熟，看重的是启发积累而后自修自得，章章推究，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心粗意广，老死讲义，所谓“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朱熹1983：17）、“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朱熹1983：235，《孟子集注》引程子语）、“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黎靖德1986：98），经教师引导学生精读，再自习附选，正是传统读书法的拿手好戏。以民国出版人王云五眼光看待中学，小学之进阶大学之预备，严格来说中学毕业已能独立研究，写出二三万字的论文。<sup>10</sup> 篇目如此设计，就毫无意外了。

再看第四项便知编委会完全是以最上等的教育目标期许。发扬立国精神与表现中华文化，皆有点时代特色。建设“马来亚文化”，萧先生的作品已经不是第一次提过，就我目及材料，第一次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独立后第一期钟灵校刊编后，国家方建有此热情或许不出奇，但随着时间流逝，他的情感确是越来越浓，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长文〈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对马来西亚的贡献〉（萧遥天1964）可说是这方面的体现。高尚品格与民主科学则完全是五四时期知识领袖坚信的精神价值。就此认识而言，杂糅人文、民主、科学，无疑是高见。这一洋洋洒洒的标准，虽附于《华文》课本，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编委同仁深信不二的时代精神。

### 三、《华文》教科书分析

以下酌取五项《华文》课本过人之处，以显出应有之地位。

#### （一）逆序

中学教育特别重要，正在那链接式的特点，教育学家雷纳指出：

以施教对象而言（individually），那是介于儿童与成人当中捉

摸不定的青年人；以学校制度而言（institutionally），它是紧随着初等教育而望向大专院校的学校设施；从智力发展来看（intellectually），它正是处于组织新知识并确定其精确性的发展期间——即介于孩童对于整个知识界之迷惘与大学学生学以反省致用二者之间；从美学关照而言（aesthetically），它是对于存在物的匀称美之欣赏期——即介于孩童对于偶像画的先入为主观念及大专学生对于艺术加以条分缕析之间的赞赏期；以情绪而言（emotionally）那是青春期——即介于儿童的爱及成人的雅谑之间具有爆炸及不稳定性期间；以社会观点而言（socially），学生之年龄已大得不必如儿童般的予以保护，但放纵其自由也太过危险，故仍须采取相当的约束政策（partial incarceration）。

（Foy 1968: 319）（林玉体1970: 410）

因此，中学课程责无旁贷的任务，变得极为关键，课程与宗旨，犹如皮肉唇齿，息息相关，有怎样的认知，就有这样的课程。学校教育的目的正在以变化气质的有意设施，实行以达到教育为志业。对“知识”“精神”“人文”的体现，随处可见于五八年华文课程，是故课程本身无法单独立论。

林连玉当年嗤笑李诗氏（A. W. Lacey）那份拟中学校课本古文三百篇，说明官高权大未必就等于懂教育，对他人指指点点。今日还可见到这份古文三百篇，既不是选学派，也不是桐城派，也看不出有甚么西学教育学支撑，完全一塌糊涂，毫无章法。难怪林连玉要抗议。这攸关中学承先启后，一失足，整个教育素质随之崩塌。譬如中一收录前五位名篇多寡，明文十三篇、唐文十三篇、清文十篇、宋文九篇、周文五篇。既有左丘明春秋左传，也有梁启超游台湾书牒，纵横两千年。反观，五八年萧编本则采沿流溯源，完全是他民初背景接渡过来的分寸感。林纾弟子朱羲胄老早就在介绍恩师《中学国文读本》，特别强调：

其编辑凡例，由近代而递贯及古，犹水之沿流而溯原也，虽未立类目，而各以类从，数千年文章轨则，于斯略具。

（朱羲胄1949: 7）

一九一二年七八月召开的中华民国临时教育会议在〈中学校教科程度及其支配标准〉，要求国文第一学年“讲读近世文以清文明文为主”，第二学年“讲读近世文以元文金文为主”，第三学年“讲读中世文以唐文汉魏六朝名家文为主”，第四学年“讲读中世及上世文以周秦诸子四书五经为主”。（〈中学校教科程度及其支配标准〉，1912）（李斌2012）同年十二月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将这些要求简化为“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这是硬尺度，教育部把关严谨，且都是文言白话混选，文言文数量按年递增。回观萧编本完全是亦步亦趋倒锥排序，编辑要旨说明，选文系从近世而渐进于古代，由近而远：

本书选文系从现代、近代而渐进于古代，由近而远，使学生从亲切的现代和近代的读物读起，进而研习古代之文学作品及学术思想。如此循序渐进，教与学自易提高成效。

尤其尽可能排出明显的主题一束，配合主题讨论近世之文亦见调往高年级附读，使学生从亲切时代读起，进而研习古代之文学作品及学术思想。如此循序渐进，同题异文，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教与学自易提高成效。我手上用的是黄国耀先生于钟灵中学读书时期所使用的全套《华文》，一共二百六十二课，但这也并非五八年《华文》之全部。因为当日学校有自己增删教材之自由。若求全，需补上号称综合各本，同样是萧编《华文课本古文语译》（萧遥天1960-1984），才算完整。像这样规模的课本，代表作之多，确有让人惊艳的感觉。今时今日谁还有能力端出来？历代经典名篇大体选录，编者非常清楚，《华文》课，最终根基是经典发挥的作用，站在先辈肩膀上带来的美学熏陶，是其他科目不能企及的。最怕是课本满纸启人疑窦“本社编”，误以为是编辑改写功课的演练场。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愈是多“本社编”，则离中文教科书本意愈远。对比今时条分缕析的《华文》，五八年人真“迂”。能开出让后人称羨的必读书，萧编本甚至南渡新加坡<sup>11</sup>，无论从教育史、文化史分析，意义皆不容小觑。

## （二）文字学个案

读书须先识字，这是考据老话。五八年别具一格的设计，正配有《文字学》一书。熟悉教育史的人，当然知道此念头，决非独创，而是渊源于清代朴学，民国大学建制化以后的流风余韵。一九一三年三月十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中学校课程标准〉延续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对中学国文的规定，进而排好教学秩序：中学国文第二学年兼授文字源流，第三、四学年兼授文法要略，第四学年兼授中国文学史，四年首要教学任务，是讲读文章和作文。

考据家的文章观念对中学国文教学的影响体现在刘师培编辑的《中国文学教科书》中。该书第一册于一九〇六年出版。刘师培在〈序例〉说：“中国文学教科书计编十册，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这种独创的编辑体例，出于刘师培如下考量：

作文之道，解字为基，故刘彦和有言，集字成句，集句成章，又谓观乎尔雅，则文义斐然，岂有小学不明而能出言有章者哉？夫小学之类有三：一曰字形，二曰字音，三曰字义。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训诂无据，施之于文，必多乖舛。今之学者于长卿子云咸推为文苑之雄，岂知司马作凡将，子云作训纂，固俨然小学之儒哉！则文学基于小学，彰彰明矣。不揣固陋，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

（刘师培1936）

“文学基于小学”，这跟章太炎的文学观念近似。清末民初章氏弟子进京，名满天下。只要看教育部两大组织——教科书编纂处，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暨教授要目编纂会——许寿裳、陈问成为正副主任，委员有白振明、毕惠康、覃寿堃、刘庚藻、高步瀛、罗惇齋、沈尹默、夏锡祺、俞明谦、马裕藻、郑朝熙、王树屏、苏德广、赵广海、赵家英、赵赞元、周庆修、熊崇熙、陈衡恪。沈尹默、马裕藻、许寿裳，同为章门弟子。

此等学术趣味，由萧先生承接体现到五八课程上，开宗明义第一“何谓文字学”：

“文字学”这个名称，旧日叫做“小学”；由汉代至清末，二千余年来相沿不变。小学就是当时用作教学僮的一个所在，和现代的小学相同。…近人章炳麟以为古代小学所教导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书”不过是六艺其中之一，不能代表六种科目，故将“小学”这个名称，改为“文字学”。

（《文字学》：1）

萧先生这番说明，完全是章太炎会说的话。（章绛1974：2981）<sup>12</sup> 即便《华文》是萧氏手笔，吾等又如何得知《文字学》也是个人而非集体创作？萧先生文章《转注假借正解》直接透露此前华教史不为人知的秘密：

近日编写文字学讲义，是书为马来亚华文中学高中课本，下笔时须估量当前马华高中学生的程度，力求与之适合，故行文尽量通俗化，叙述由浅入深，务使这专门性的学问，成为读书识字的基本知识。其中对于创造文字的法则——六书，综览古今诸家解释，详察得失，重为爬梳。就鄙见所及，总希望把六书的界说，分类整理得更加清楚明畅，举例也不厌求详，俾学者参证更易了解。

（萧遥天1959）

“是书为马来亚华文中学高中课本”，正是这句才让人恍然大悟作者身份。这还不够清楚吗？《教师杂志》乃教总所出，林连玉、严元章、黄润岳诸君俱在，他们难道会容许作者信口雌黄？其中划线的两点标记，乃今本《文字学》特点。释六书之名，引郑众、班固、许慎诚属意料之内，其后长串录下卫恒、江式、颜师古、张参、徐锴、郑樵、张有、周伯琦、杨桓、戴侗、赵则古、吴元满、王应电、戴震、江声、曹仁虎、段玉裁、桂馥、严可均、朱骏声、王筠、杨慎二十二人，则绝非专精诸家之学不可。再以“第六课：象形释义和举例”为证，引许慎、郑樵、刘师培，佐以十

二例，分独体象形八例，合体象形六例，变体象形六例，文末发挥象形造字之局限，另举八例，带入下课其他造字法，真是“不厌其烦”。

当然例证多寡，人言人殊，更重要的证据，直接来自遥天先生一九六〇年创编《教与学月刊》，或许出于缺稿，“何谓文字学”竟然修缮后，以“萧公畏”化名刊出。（萧公畏1960）萧氏，表字正是公畏。

这里无意专门讨论萧先生语言文字之学得失，完全的对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为了突显萧先生是五八年华文背后制作者，兹再引一内证，以为此节收煞。《文字学》“第十一课：段借释义和举例”：

段借的起因，起于“本无其字”，是指段借字段形言，“依声”是指段借字的音言，“托事”是指段借字的义言。但在“形、声、义”之中，又以“声”为主动。

（《文字学》：52）

以上叙述，完全见之萧先生他文，只不过把“主动”改“主要条件”罢了。（萧遥天1960）特别要提醒的是，萧氏晚年，准备将一生名山事业付梓，其中有目无书者名《文字学通解》，下落不明。综上所述，可以负责任说，这本佚书，前身即《文字学》。

种种证据所示，这套别具只眼的独立一代课本的作者乃萧遥天，至此可说定案。

### （三）文学史视野

五八年《华文》旨趣偏向文学性，也是本邦建国以来中学教科书中，极为罕见。

只要明白胡适之建构白话文学史对白居易诗浓墨重彩，与萧编一比，就可推出萧氏选白居易亦明显较多。过渡时代华文教科书大量入选历代诗词曲，大概跟胡适等人将此作为明清以前白话文学史的主体有关。谁都明白，知识，可以系统的方式传授并记忆的方式获得语言、文章、语体概念等方面的学问。选甚么删哪些文，拆解名篇为名句，这些教科书的“编辑

技巧”，反映时代风气，靠知识，也靠胆色，因为《华文》归根究底，万变不应离其宗，看重正是欣赏二字。

《华文》课本不是杂锦工具箱，应该有意义的排列，不只是知识生产，也是文化传播。胡适说，自《老子》、《论语》、《檀弓》、《左传》到姚鼐、曾国藩，每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就是最切实的中国文学史。（胡适1986a：247）其“具体的文学史”一说，代表了当时的普遍看法，反映到五八年就是重视“看书”，而不是“讲读”。两套教学法，差别在读写宜短，看者不宜过短。（钱基博1924：2）凡是于一派者，只讲授其代表作品，其余附选于次，以备学生自己参考就是了。纵观之，如此编排不至束缚学生的性灵及文笔，仅以历代文章之真价值，作一部文学史观。

《华文》主张时代为主纲，以历代艺术文和学术文为内容，编排顺序上按时代逆溯，最大的妙处在于免去空疏或纤巧的毛病。书中选录《明湖居听书》《美猴王》《景阳冈武松打虎》《王冕的少年时代》《刘老老》《最后一课》等名篇，并配合选录梁启超《论小说与羣治之关系》、胡适《老残游记的文学技巧》《论短篇小说》等小说评论，构筑文本与评论的关系，词选配静安，戏曲配瞿安，都有策略的估量，帮助学生鉴赏批评，视通万里。

这些意见显然受胡适之、陈独秀的影响，以新文化的眼光重构文学史，并决定《华文》教科书拣选标准。陈独秀认为：“文之大别有二，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刘君（半农）以诗歌戏曲小说列入文学范围，是即余所谓文学之文也，以评论文告日记书札等列入文字范围，是即余所谓应用之文也。”（陈独秀1917）再看胡适之在北京高师附中演讲“中学国文的教授”。他设定中学一、二年级应每周教学一小时国语文，其教材“应该带文学的性质”，包括三类：一是小说，主要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二是白话的戏剧，三是长篇的议论文和学术文。（胡适1986a：243）

胡适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

《红楼梦》；宋人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胡适1918）这在《华文》得到体现。《华文》的篇目，多是《新青年》同人作为白话范文所列举。其所选〈木兰歌〉〈石壕吏〉，胡适之、钱玄同等人曾给予颇高评价。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讲稿，认为国语文的教材，包括姚鼐、曾国藩、林琴南、蔡子民、《老子》、《论语》、〈檀弓〉、《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同见萧编本。“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胡适并将其篇名列举出来。（胡适1986a：243-254）《华文》所选的明清白话小说，均在胡适之列举的范围之内。适之先生〈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拟出四书、国策、韩愈、欧阳修、王安石、朱熹、王守仁、清代经学大师文选、严复的译文选录、诗经、古乐府、白居易、杜牧、陆游等名家名著（胡适1999：277），来到萧编本，皆浓墨重彩，一时之选。

古今志士学人千变万化，各有至处，学术文纳入范围，并无问题，且文气纯粹而无流弊，关键是叙述得有头有尾，干干净净，要深入浅出，容易了解。以问题为纲领组织选文，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近代思潮”。一如王静安《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任公〈论小说与羣治之关系〉“说明小说的价值”，适之〈文学改良刍议〉“现代文章开始全面语体化”，到蔡子民〈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大谈“文艺复兴运动”，甚至瞿安《中国戏曲概论》倡论“戏曲与诗歌、舞蹈、小说的关系”，皆是观念开放、情理兼具之作，穿插诗文之间，彼时道理闻见均不成妨碍。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可说各肆其端，各博其趣。

#### （四）评注

中文教科书评注系统完善与否，亦应在考量之内。《华文》课本每篇文末总评后，列出本文词语典故，在每条下注音释义，点明出处。助读系统得以陈明撰写者识见，往往小处见情致。民初教科书的编辑方法，以要旨、评论、注释，突显自家眼光与趣味，五八年《华文》也继承下来。评

介课文文学趣味与用字用韵，如燕归来〈新绿〉：

作者心目中的主题是社会中的维护真善美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当前黑暗时代中的“自由浪潮”。

本诗的体裁相当严谨：八节之中，第一、三、五、七节是每节五行，第二、第四、六、八节每节六行。

本诗的长处在于兼具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全诗以理性为骨干，以感性为血肉；笔力雄肆而笔触细腻，气势豪迈而气象清新。

（《华文》一上：29-30）

又薛洛〈马来亚的黎明〉注“朦胧”，引譬连类，清朗可喜：

天将亮、月欲回，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的景色。李峤诗“朦胧烟雾晓”就是这个意思。

（《华文》一下：3）

又刘鸱〈大明湖〉注“燕王”二字，知识饱满，直如小传：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名叫朱棣，封为燕王，驻节北平。朱元璋死后，嫡长孙朱允炆继位（一三九九），即建文帝。燕王想夺他的皇帝位，遂于当年七月在北平起兵反，到了一四〇一年六月，攻陷南京，允炆出走，生死不明，朱棣自称皇帝，迁都北平，改北京，是为成祖。

（《华文》一上：34-35）

又分析诗，白居易〈慈乌夜啼〉：

本诗及下面那首燕诗，全是五言古诗（古诗又称“古风”），简称五古。

本诗用“诗韵”中的“十二侵”韵。

本诗主题在藉慈乌念母的深刻悲哀，来提醒世上那些不敬父母的无耻子女。用语造句都极平易自然，不愧“老妪童子都能上口”

的称誉。

(《华文》一上: 69-70)

引伸及〈燕诗〉:

本诗用“诗韵”中的“四支”韵(雌、儿、孜、期、疲、饥、枝、悲、思、时、知)以及“五微”韵(肥、衣、飞、归),“微”韵在古诗中可通“支”韵。

(《华文》一上: 71)

这真是严肃在谈文论艺。撰写者娓娓道来者,自是博雅之人,而且本身要熟谙创作方可,不是胡乱白话翻译一遍,添加的的了了,将美人变骷髅,忘了能白话全译的诗,往往是烂诗,以致满纸情景交融、千古绝唱,共出一套的所谓导读,学生则根据表面价值来接受信息。五八年对典故出处相当重视,屡屡引述他书为证,甚至直接引用前人注疏,无征不信,字斟句酌近乎严毅固执,如〈没字的书〉注“每况愈下”援章太炎《新方言》看法,注“受用”称《朱子全书》名句,注“充塞”举《淮南子》高诱断语。

《华文》还增加“讨论”环节,列在文艺赏析之后,与学生经历见闻并所读文字相印证。发问也是学问,起头一定要高,万勿看小也看扁学生。如薛洛〈马来亚之歌〉,

一,甚么叫“侨民”?甚么叫“公民”?

二,在过去二百年的期间,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移民,在新大陆建设了一个世界第一等的强国——美国,他们自始便把自己看作是那个新国家的“主人”。然而我们华人来到马来亚已不只二百年,但在独立以前,多数人一直把自己当作“客人”,称为“侨民”。这是甚么原因?影响怎样?

三,甚么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条件?

(《华文》一下: 5)

“回到你自己”“个人判断的权利”，是文学面对现实和历史的基本立场，学生经验是否看作有效的知识形式，至今依旧是大哉问。又如任公名篇〈最苦与最乐〉，

一，一个人的人生观不必和别人强同，你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和作者有甚么不同？

三，就你自己的过去来想想，你感到最苦的事是甚么？最乐的事又是甚么？这苦与乐的来源在那里？

（《华文》二下：7）

下一附选种因散文〈享福与吃苦〉，转身就问

二，文中所举释迦牟尼、孔子、陶侃、格兰斯顿等人，都是本可以不吃苦的，为甚么他们还要吃苦？

（《华文》二下：15）

蔡元培〈舍己为羣〉，在战后，他人看来当然有必要牺牲个人奉献“国家”，但萧编本反其道而行叩问：

一，你对于“舍己为羣”的主张，有无相反的意见？

四，一切的革命都得流血吗？有没有不流血的可能？历史上有没有不流血革命的事实？

（《华文》一下：133）

这等于是自由讨论他们感兴趣的时事，而不是教学大纲强迫的伪自由书。以现在过份依赖教师指南、标准答案为中心的教书生涯，如此考究识见、举一反三、步步逼近的课文，还不如跳过不教。可知编者以问题为中心，排除故见的第一法门，注重出处，讲述文意，评批作法之余，兼顾艺术与思想，保持对于思想垄断的警惕，“不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胡适 1986a: 249）。最重要的是让后人警醒，中文课不是验尸房，熏染与感想第一，而不是肢解组装，碎义逃难。五八年《华文》评注，往往于常见词

语之用法随时提示，二从所读篇章出发，教读者想开去，或者自省体验，或者旁求参证。故落在文字，则看造境之美，如何是深刻动人？如何是平易自然？看句法排列，如何是互换字词？如何是字句松弛？看声调抑扬，如何是据谱改韵？如何是文章气势？看风格姿采，如何是自然套袭？如何是陈言烂调？看文体明辨，如何是章法谨严，如何是随想随写？如何无一事不凡无一语不凡？

正如前提燕归来〈新绿〉或薛福成〈猫捕雀〉，譔写者突出其“讽刺压迫人民的特权阶级”的“残民以自肥”，徐旦木〈母亲的病〉“一个被放逐了的亡命者”回不去的忆母忧思，冰心〈往事〉本是一篇美妙的散文诗，主人翁却是“异国卧病的少女们的复杂微妙的情怀”，陆次云〈费宫人传〉、刘基〈尚节亭记〉“提倡气节”“辨别忠奸”，薛洛〈马来亚的黎明〉“象征觉醒”的独立建国的新时代，徐志摩〈想飞〉吕梦周〈水的希望〉佐拉〈猫的天堂〉谈“爱好自由的情怀”，〈大铁椎传〉作者身受亡国之痛，隐居不出，“对历史上刺秦始皇的大力士，有无穷的羡慕和向往”，蔡元培〈舍己为羣〉固然不错，“如果以抽象的羣体作为最终目标，强迫大多数个体为它而牺牲，就成了集体主义”，或都德〈最后一课〉陈之藩〈失根的兰花〉之去国，鲁白野神驰“没有偏见的马来亚历史”，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家国之爱，郑子瑜〈林烈士谋盛传〉以身殉国，方苞〈左忠毅公轶事〉的表章忠烈，诸葛亮〈出师表〉之“南征北伐，光复汉室”，全带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并非纯属偶然，都像是几度乱离，方死方生之人，才说得出的话，是谈文论艺之外的别有幽怀。以上都无伤大雅，若不是天涯沦落人，心知其意，或研究者的有意诠释，并立突显，毕竟只是大段一细微处，单独视之，读者根本不会发现此心头块垒，眼底风光。

## （五）选文

五八年《华文》包罗各体文，诗词曲赋、语体文、诗、话剧，皆有顾及，还选了十七篇译作，可知譔者眼中名著名译，作者究竟何国何籍，根

本不在权衡之内，既有屠格涅夫、都德、佐拉、赫胥黎，也含丰子恺、严复、刘半农、胡适之。

下表可见体裁分类：

表一：《华文》课文体裁比例

诗赋	23 (8.78%)
词	3 (1.15%)
曲	4 (1.53%)
新诗	3 (1.15%)
文言文	111 (42.37%)
白话文	87 (33.21%)
话剧	1 (0.38%)
文言小说	6 (2.29%)
白话小说	13 (4.96%)
翻译	11 (4.20%)
总课数	262

总体而言，大略可分文言与白话两组，则前者占56.10%，后者占43.90%，属于文言比例偏高，反映编者爱好，也与适之先生的设想一致（胡适1986b：173）<sup>13</sup>，考虑的是教学，而非主奴之见，当然也可能是白话文作者背景禁忌较多，此时此刻不易采摭。合观全目，萧编本容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民国文章最为丰富，占总篇数的25.98%强，符合“使学生从亲切的现代和近代读物读起”的要旨。再以民前论，收最多的是清文与先秦文，各8.15%，其次是宋文5.74%，唐文5.13%，皆是名篇辈出的大时代，特别是编者强调涵容“自抒情、记叙，而说明、议论”的原则，更需来此取法。至于诗词，宋代占6.4%，唐代次之有5.43%，汉代又次之占3.32%。《华文》最受钟爱的苏轼文，一人就占了八篇。胡适之、朱自清次之，各六篇。

理想的《华文》教科书不薄今人爱古人，兼及古文、今文、新语，庶几知上下古今之变。课本不是文派选本，本来就以成见去诠释或排斥另一

种表达，无知以为那是一种“必然规律”。萧编本是古今中马外派，蕴涵背后的是时代深度与思想渊涂。值得注意的是，课文带进翻译，欢迎“新语”引入，惟均十分警惕。徐志摩〈海滩上种花〉有一段分析，非常不客气，可见编者任务并不仅仅选文那么简单，还要照顾万千初学者读后感，不敢丝毫懈怠：

由于本文作者欢喜用外国语言的结构搬来套在中国语言的头上，所以有时不免于生硬，在本文是这样，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是这样，乃至他的所有文字都是这样。每一个作家有每一个作家的风格，很难加以批评，不过，初学的人，对于像本文中的某些句法，只要知道就行了，可是不必摹仿的。

（《华文》二上：92）

分析实斋〈古文十弊〉时，不忘再扫一把：

这是针对当时文人的言论与撰著，举出其种种弊病，而加以匡正的一篇极重要的文章；其中所指摘的，即使是在现在语体文中，也还有许多相同的情形，应该加以纠正。

（《华文》四下：106）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语言癌”“欧化中文”“不识大体”。编者的苦语针砭，简直是醒世恒言，而我们的萧遥天一九五八年已经说完了。

或许出于政策，《华文》课本最显著也最可议，是甚么都有了，偏偏缺了千不该万不该埋葬的鲁迅。

《华文》试图藉课本抹煞鲁迅为领导的左翼文学，引导学生亲近胡适之一派的文学趣味。不要忘了，“三个伟大”的鲁迅长久是政治化的鲁迅，为中共所利用，无论左倾作品或“匪区”作家，乃本邦禁忌。钟灵中学学报第四〇期登了鲁迅遗像招致训导主任叶志颜不满，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政府以紧急法令逮捕七人，可以为证。（《马华公会檳威分会乔治市五支部研究华文中学校学潮十五人小组委员会报告书》，1957年5月3日）（《星报》1955年8月12日）此一事件，显示冷战时代的势不两

立，壁垒分明。

若以前后两种《中华文选》比较就更明显了，六卷本出版于一九四〇年代上海，收有鲁迅〈秋夜〉、〈好的故事〉、〈雪（二）〉、〈风筝〉、〈鸭的喜剧〉、〈故乡〉，并译岛武郎《与幼小者》。

一九七〇年中华书局为马新度身订造八卷本《中华文选 增编本》，没有〈雪（二）〉〈与幼小者〉，但增补〈一件小事〉、〈孔乙己〉、译鹤见佑辅〈读书的方法〉三篇，还有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算是重视作者特别作深入介绍。这些在五八年本，完全不见踪迹。

于此进一步两厢比较四〇年代中华民国、五九年后民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李斌2012：179），最明显的是党义官文一概蒸发，消解了疯狂时代要完成政治教育的干扰。如孙逸仙、蒋中正、蒋经国、毛泽东、马恩列斯之文。当然，消失的党义也是另一种政治，比如四〇年代《中华文选》，在〈岳飞之少年时代〉、〈王冕的少年时代〉之前，打头的其实是〈孙中山先生的幼年时代〉，来到《华文》就只留岳、王，而无后者“毅然起来革命”的露骨。中文课不是党国课，不该主一家之说，更不是公民课，认鸡作凤。如今课文或连小经典都算不上的充数，或故假捏出华强三美阿里，旁添一木都，将词汇表塞进呆滞的嘴巴。文学教育若并非主角，堕落为政治附庸，则铁定辜负文学本质带有的超前意识，为爱国思想、国家政策绑得无法自由呼吸，直勾勾关心自家的肚脐眼。严格而言，五八年制华文教育是隔代遗传，直接与晚清民初一代教育家对话，倾向文人传统与学人兴味，此借来的时空，可称中华民国在南洋。

五八年课本还有精彩之处，收录二十六篇与南洋相关文章，或作者终老南方，或强调文章刊于此地，既有本土风光，也不忘异域之眼：

表二：《华文》有关南洋书写课文

胡姬	萧遥天
马来亚民族英雄汉都亚	鲁白野
马来亚之歌：马来亚的黎明	薛洛
我爱马来亚	姚拓

太平山游记	谢冰莹
在我们的国土上	金轮
谈马来亚的历史	鲁白野
附选：林烈士谋盛传	郑子瑜
马六甲游记	郁达夫
新加坡洪家花园记	郭嵩焘
热带三友	吴进
班顿八首	佚名
“马来亚建国史”序	许云樵
马来渔船的下水礼	曾铁忱
槟城三宿记	郁达夫
四城记	萧干
中国古籍中的马来亚	许云樵
百多年前马来亚印象记	海录
郑和传 节明史列传	明史

以上这些篇章，比较《中华文选 增编本》，就只有郭嵩焘〈新加坡洪家花园记〉与郁达夫〈乱离杂诗〉〈马六甲游记〉三篇。大概是宋文翰本身并不熟悉南洋风土，无法充分把握其特殊性。不像萧氏早已有族人南迁，此前亦出入多次，定居此地后要找到相关材料，显然有地利优势。

从开列篇目可知包含各种体式，作者背景杂多，内容宜古宜今。纳入新诗，不排斥班顿，既有三个前海峡殖民地风光，也不忘为新建国家，加枝添叶。

《华文》属“文选型”教科书，必然以“取法乎上”为目标，由评注系统的提示，配合中国文学史知识，考据历代文学之变迁，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这种藉用上等文章引导学生捕捉生活所思所想，欣赏名篇，体验创作，选文之后的“讨论”栏目，正由此而生。〈胡姬〉讨论题其一是“试模仿本文第一章推层衬托的技巧，自己命题，也写成一段或一篇散文”，〈蝉与萤〉“试以‘蚊与蝇’为题，写一篇散文”，或者读〈离骚〉而要学生以新诗改写，或者玩味〈最后一课〉之余，要学生自选读过的短篇小

说二者比较，并见中文训练、文学欣赏与文化遗产如何走入课本。而任何语言的使用也不鼓励局限在特定情景。

#### 四、余论：读者来函

编写者身份已明，本文最后打算谈一谈读者訾议。一九六二年来自麻坡读者鹤翔，要求重编刚出齐的课本：

一般上说，这类课本所编选的文学都嫌过于艰深，超过了学生实习该种教材的心理年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我猜想，是由于编订者曾参考过去宋文翰所编的《中华文选》，受了该书的编选标准的影响所致。因为我曾经参照过这些书，发现新编的教科书中有许多课文是从《中华文选》里“搬”过来的，甚至连“题解”、“注解”、“语文对译”都毫无差别。

（鹤翔1962）

这项指控严重，在当事人鹤翔身份不明下，原无需多费唇舌，但要找到更多当年教科书回响，其实不易。换个角度看，也未尝不可视之为关心教科书者的建言。姑不论课本编制原就需要大量参考他人成果<sup>14</sup>，宋文翰编《中华文选》又是此前颇受欢迎教科书，倘使课本的选材不免因袭旧书，也算正常，毕竟不存在自创体例，选文毫不重复的眼光。今藉此机缘，窥见异同得失。

宋编《中华文选》诗文二百五十三篇，分六册，萧编《华文》三百三十五篇，每年级分上下册，共十册。其中互见八十五篇，三十二篇见萧编册一，三十一篇册二，十六篇册三，四篇册四，二篇册五。《中华文选》先列文章，文末有题解、作者生平、注释、习题，《华文》作者、题解置于正文前，文末附注释、提示（主题、体裁、分析、讨论）。后者无“语文对译”，而前者有。

萧编第一册起头安排三篇劝学文，即甘绩瑞〈从今天起〉、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胡适〈读书四到〉。宋编〈从今天起〉编入第二册，彭

文作〈为学〉入第三册，无胡适文。《中华文选》不是按年代主题排序，编次未有明显脉络，更像是以文白比例排列。

作者题解，范围狭小，无法据以判断，材源容有疑问处，多是萧编更丰富，或即《中华文选》基础上订补。如

#### 中华文选

【作者】甘绩瑞，今人，里籍生平未详。

【题解】本篇采录《事业与修养》而略有改动，旨在勉励学者勇于改过迁善，不可因循自误。

（宋文翰编1946：6-7）

#### 华文

【作者】甘绩瑞，现代人，籍贯事迹不详。

【题解】这个标题“从今天起”，只是半个句子，语意并不完全；不过却极为醒目，具有吸引读者的作用。无论谁见了这个标题，总得要问一句：“从今天起该做些甚么呢？”那么，要想得到答案，就必得一读正文。本文所叙，在劝人改过迁善，都要从今天开始；也就是“即知即行”，不推诿、不因循的意思；这在本文的开头已由详细的说明。

（《华文》一上：1）

萧编本顾及美学感受，以教科书言，更高出一头。

若论斟酌工夫之细，均是孔壁六〈日观峯观日出〉，两者比较，《中华文选》删去文章第一段“天地氤氲，沆寥、沆瀣之气，以息相吹，野马耶？尘埃耶？茫茫无所止极矣。况于微风澹雾，密雨浓云，皆足障远，而欲穷千里之目，迎初日，观海水，其数往而不获一觐也则宜”。萧编本照原文补正，同时提问：

一，把首段去掉，是否可以独立成文？

二，你对本文的结构，是否有“有头无尾”的感觉？

（《华文》一下：70）

真是字字不肯放过，完全是深谙文章之学，写作技巧与文学感觉的追问。文学鉴赏力与宋文翰一比，高下立见。再看彭乐斋文：

中华文选

《为学》

【作者】彭端淑，字乐斋，清四川丹棱人。雍正进士，由吏部郎中出为肇罗道。寻归，努力为古文辞。后主讲锦江书院，极为时人所推重。著有《白鹤堂诗文集》。

【题解】本篇采录《白鹤堂集》，旨在说明为学贵先立志。

（宋文翰编1947：2-3）

华文

《为学一首示子侄》

【作者】彭端淑，字乐斋，清朝四川丹棱县人。雍正（清世宗胤禛年号）十一年（一七三三）进士；由吏部郎中出任肇罗道。不久便辞官回家，致力古文辞，主讲锦江书院，名重一时。他的诗文，朴实厚重，不尚辞藻；著有《白鹤堂诗文集》。

【题解】本文是作者教训他的子侄们的一封信。文中讲的是研究学问的问题，所以称做“为学”。一首，是一篇的意思。示子侄，是给予侄们看。

（《华文》一上：5）

萧编是否毫无差别搬过来，视而可识。好在历史自有公道，证据太明显了，若要完全照搬，何以篇名不同？还有更重要的是，宋编末句“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自立者也”，萧氏录为“自力者也”，出注“自己努力，自己勉力”。不用说，只要熟识彭文者当知此公案，毫无疑义乃萧是宋非（彭端淑2010：45）<sup>15</sup>，宋编则斟酌未精。

《华文》的“新尝试”，在于课后“说明”。“说明”作为国文教科书助读系统的一部分，这并不新鲜。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胡怀琛《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其部分课文后也有“说明”。但《华文》课后“说明”的内容，确为独创。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设计了“文学概论和

作文论”及各种文学知识。

这样的成绩，无论从教育视野与文学质素，这是由特定时空“吾道南矣”的产物，他日再难企及。可忧者，乃是逐渐封闭的思想，特别是今日教育专家缺席，而满街都是所谓特洛伊木马<sup>16</sup>（“这个能投诉吗”“我家宝贝看不懂”“华文评估深奥连我都不会”），重新贬旧，官商关系暧昧，教育失灵，一枚莲图都要周身蚁。当然，现时的教育制度并不是设计来培养具有人文与民主的现代公民。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我们还能找到像遥天先生那样格古通今，认真执着的“传统捍卫者”吗。

教科书选文要有汰选目光，捕捉各时代文风，提供以资左证的理论文章，尽最大的能力破除政治樊篱，以及对编辑拥有生杀予夺权力，对他所带来的傲慢与偏见，随时保持警惕。我们曾有一度，华文课教材的丰富，文化修养的深浅、思考的周详，范文系统与语文学、写作、自修相结合，丝毫不亚于时下大学的恢弘。一九五八年课本，可能是华教史上最早也是最好，历尽沧桑，随着时移事往淹没于华教史，选文之精赅，文笔之清丽，也可说是永远不再了。

## 注释

- 1 五八年版涉及两套中学制度，一是旧制六年，一是新制五年。内容分配微有不同，特别是前者多了整整一年预备班。像周作人〈小河〉、陈纪滢〈妈妈的生日〉、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泰戈尔诗二首〉诸作，都是给预备中学阅读，并多一条要旨，“参照历年华文教学之经验和现代各国语文教学之原理及方法，在选材与编辑方面力求深浅合度，并顾及教育意义和学习兴趣”，纯从吸引初学者为鹄。新本皆省去。旧制预备班分两册，其他学年各三册。此处主要以学术生命较长的五年制为准。争拗起因见（林连玉1988：174-177）。雪兰莪教育局发出通告要求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中学逐渐配合新制，可知有段时间两套课本并行。两者“编辑要旨”，差别在旧本说明新旧制如何对换，新本完全行五年制，故不再说明。
- 2 西德驻马大使馆确实那段时期交接，但无法得知这位代理泡来斯其人。据知，Dr Hans-Ulrich Granow（1957/10/1~1958/9/26）与Dr Georg Vogel（1958/12/23~1961/5/23）时任大使。（2016/9/26大使馆函）
- 3 承陈沛文先生代查，乃孙家驹。

- 4 篇末志期五七年八月十八日。纪录八月六日起至十六日止，前后见了不少人。其中一段寻潘重规不遇，详（萧遥天1979：85-91）潘氏长时任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学标准教科书国文科编委会成员，见（苏雅莉2005：36，50）。
- 5 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认为某一教科书诞生反映的是那时期的“我们”（而不是“另外一些”），虽说我们并不直接参与。参（侯定凯2005：5）。
- 6 萧先生事迹、社会参与、文化取向，见（方美富2014年6月20日~21日）。
- 7 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Suruhanjaya Syarikat Malaysia）档案。
- 8 黄锦树读过的四上，一九七三年初版，一九八九年再版，则影响时间比我的版本还要更长。文中提供的目次、页数、版式，所见一致。参（黄锦树2014年9月）。这部四上，黄氏印象深刻，正是他过去的用书，并对此评价甚高：“那被遗忘的选文让我吃了一惊”。
- 9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国民型中学试用华文课程纲要”。七九八〇年大变革是华总的汉语拼音与简体字建议。教育部课程发展总监覆教总函言及此事。这念头起自一九七六年五月教总常务理事会，课程走向“听、说、读、写”训练。
- 10 王云五多次提到中学初步治学能力，可知是当时普遍看法，详（王云五2013a：180）（王云五2013c：207）（王云五2013d：181）（王云五2013b：198）。
- 11 新加坡教育部于一九五九年二月颁行中文课程标准。我无法觅得来自同一藏家的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上至四下，共八册《华文》课本，参杨培联论文抄录课文，明显是从马化版基础上修订。（杨培联1971年）新化内容较少，排挤部份内容在所难免，主要压缩学术文、增补入鲁迅、减马化附选。未来者应就五八年五九年版两岸教科书编撰，管其得失。
- 12 书内论文字的朐造、转注段借释义、声韵概说，更是明引章氏看法。
- 13 适之先生最早的想法是国语文占四分之一，古文四分之三，后修正为古文钟点可多，但不得过全数三分之二。又参（梁心2009年）。
- 14 譬如一九三三年朱文叔六卷本《初中国文读本》。大家理念相似，恰好有同样的读书教养，这才使编者“闭门造车”而竟能“出门合辙”，重迭之处，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
- 15 同例见朱自清〈一张小小的横幅〉魏学洵〈核舟记〉苏雪林〈收获〉还原全文，以存其真，或以《血花集》订正林觉民〈与妻诀别书〉，涵芬楼本厘正司马光〈赤壁之战〉，《文山集》补正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昭明《文选》改正贾谊〈过秦论〉，李斯〈谏逐客书〉则“以《史记·李斯列传》为底本，更参照《文选》及《古文辞类纂》各本，详细斟正后排印的”。
- 16 木马基本特征是外表华丽，思想呆滞，效应是极度的厌学情绪，见（侯定凯2005：5-6）。

## 参考文献

- 《文字学》。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方美富2014年6月20日~21日。〈冬虫夏草：萧遥天生平与文学考辨〉。论文发表于二〇一四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吉隆坡。
- 王云五2013a。〈中小学教科书及补充读物问题〉。《王云五全集》（第十三册）。北京：九州岛出版社。
- 王云五2013b。〈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王云五全集》（第十册）。北京：九州岛出版社。
- 王云五2013c。〈漫谈中等教育〉。《王云五全集》（第十三册）。北京：九州岛出版社。
- 王云五2013d。〈漫谈读书〉。《王云五全集》（第十册）。北京：九州岛出版社。
- 朱熹1983。《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 朱羲胄1949。《春觉斋著述记》。上海：世界书局。
- 宋文翰编1946。《中华文选》（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
- 宋文翰编1947。《中华文选》（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
- 李斌2012。《中国国文教科书研究（1912~1949）》。台北：花木兰。
- 汪云璠1924年4月11日。〈对于国立大学招考新生国文试题之怀疑〉。《时事新报·学灯》。
- 林玉体1970。〈我国高级中学课程之研究〉。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集刊》，第12卷，页361-449。
- 林连玉1988。《风雨十八年》。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 明威1974年10月24日。〈介绍萧遥天的诗书画及文史著作展览〉。《南洋商报》。
- 胡适1918年4月15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
- 胡适1986a。〈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作品集》（第三册）。台北：远流。
- 胡适1986b。〈再论中学的国文教授〉。《胡适作品集》（第十册）台北：远流。
- 胡适1999。〈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二十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第三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侯定凯译2005。M. W. Apple著。《教科书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华文》一上。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华文》一下。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华文》二上。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华文》二下。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华文》四下。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陈独秀1917年5月1日。〈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 附识〉。载《新青年》，第3卷第3

- 号。
- 1957年5月3日。《马华公会檳威分会乔治市五支部研究华文中学学潮十五人小组委员会报告书》。
- 章绛1974。〈论语言文字之学〉。载《国粹学报》（第二十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梁启超1985。《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梁心2009。〈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载《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页148。
- 许国英1914年2月。〈编辑大意〉。《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评注》（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 黄锦树2014年9月。〈华文课〉。载《印刻文学生活志》第133期，页138-140。
- 彭端淑2010。《白鹤堂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二九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杨培联1971。〈我国现行中学华文课本的研究〉。《教育专题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
- 刘师培1936。《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宁南武氏刻本。
- 黎靖德编1986。《朱子语类》（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 钱基博1924。《新中学教科书：国学必读》（上册）。上海：中华书局。
- 萧公棨1960年9月20日。〈何谓文字学〉。载《教与学月刊》创刊号，页15-16。
- 萧遥天1959年11月15日。〈转注假借正解 上〉。载《教师杂志》创刊号。
- 萧遥天1960-1984。《华文课本古文语译》。檳城：天风出版公司。
- 萧遥天1960年3月15日。〈转注假借正解 下〉。载《教师杂志》第二期。
- 萧遥天1964年12月。〈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对马来西亚的贡献〉。《钟灵中学校刊》复兴第十九号。
- 萧遥天1979。〈十日游程〉。《热带散墨》。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 鹤翔1962年12月11日。〈中学华文课本应重新编订〉。《南洋商报》。
- 苏雅莉2005。《高中国文课程标准与国文课本选文变迁之研究（1952-2004）》（未出版之硕士论文）。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中文所。
- FOY, Rena, F 1968. *The World of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